

370.12

446

萬・諾維科夫著

朱井・心羽合譯

校長手記

新潮書店印行

★★★★★★★★★★★★★★★★★★★★

校長手記

伊萬·諾維科夫著

朱井譯

新潮書店印行

1951

★★★★★★★★★★★★★★★★★★★★

前 記

當譯者第一次讀到伊凡·諾維可夫所著的這本小冊子的英譯本的時候，我們很有一些感觸。因為譯者在舊社會裏受過十幾年教育，而且剛從學校裏出來不久，所以對於學校的印象還是很鮮明的——閉着眼睛一想，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樣。不過，無論就時光本身來說，還是就我們中國的歷史過程來說，「昨天」，黑暗的「昨天」，畢竟是永遠也不會回頭地過去了。正因為這樣，所以當譯者在諾維可夫這本小冊子中看到蘇聯兒童受着多麼美好的教育而感到無限羨慕與嚮往的時候，雖不免為我們自己過去不能受到這樣的教育而感到有些不幸，但是，也正是從這本書中，我們看出了新中國教育的光明遠景，因此我們不禁為今日正在唸書的男女兒童以及他們世世代代子孫的幸運而感到歡欣鼓舞。

因為有這種感觸，所以我們願意把這本小冊子譯出來，獻給從事於作育年青一代的人民教師們，希望你們會從這本書中得到一些啓示，因而能够把你們的工作搞得更好一些；同時也把它獻給有子弟上學的家長們，希望你們能够進一步與學校合作，來更好地為完成自己子女的教育而努力。

這本小冊子共分十節，主要的內容是：蘇維埃教師的責任（第一節），蘇維埃教育

的目的（第二節），蘇維埃政府如何重視教育（第三節），蘇維埃教師的社會地位（第四節），感化教育（第五節），學校與家庭的合作問題（第六節），學校青年團組織應起的作用（第七節），少年兒童讀物問題（第八節），怎樣培養學生的興趣和技能（第九節），增強蘇維埃人民團結的一年一度的校友團聚會（第十節）。其中尤以學校與家庭的合作、教育重感化、學校青年團組織應起的作用、少年兒童讀物與怎樣培養學生的興趣與技能等問題，寫得特別好，並提供了解決這些問題的一些具體的辦法，因而也就特別值得寶貴。

這本小冊子，因為是手記，所以談到的各種問題，都是作者從自己豐富的教學經驗中掇取許多具體而生動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因此，讀起來特別親切動人。

作者在談到蘇維埃教育的各種問題時，還時刻不忘帝俄時代沙皇統治下的教育以及今日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教育情形。從這些鮮明的對照中，讀者可以看出來，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教育才是真正的「人」的教育，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教育——如果算是教育的話——不過是「野蠻人」的教育而已。

譯者不想再多說了，反正這本小冊子篇幅不大，明白的讀者花費一兩個鐘頭，便可知道它的一切了。

這本小冊子，譯者是利用工餘之暇譯出來的，而且譯者的能力很低。譯文如有錯誤，希望讀者予以批評，指正。

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我再一次站在位於牟茲利亞可夫斯基街的校舍門前迎接我的學生。許多年來，這所學校已像是我自己的家了。這是我第二十四次歡迎第一一〇校的學生從暑假歸來，和那些初次上學的小夥子。在那天歡迎三千二百萬男女孩子上學的千千萬萬的蘇維埃教師中，我也是其中的一員。

新學生都提着書包書夾，有許多還抱着花束，跟父母一起來到學校。大多數在搖鈴很久以前就到校了。他們的父母告訴我，孩子們在先天晚上睡得很少。我得承認：我自己在那天晚上睡得也不多。太多的記憶湧進了我的腦海，激起着整串整串的思潮。

關於在革命前中等學校的一年級學生受到什麼樣的歡迎，我個人沒有這種記憶，因為我生長在鄉村裏，當然，在那個時候，在鄉村中，中等學校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不過在我看來，作家V. G. 柯洛連科的見證是十分可靠的，他述說那種氣氛時這樣說道：「……假如我們曾經夢想過一套中等學校學生制服的話，那我們似乎是懷着一個青年戰士要去與危險的敵人相搏鬥時的那種雄心……。」

瞧瞧這個九月一日剛開始入學的這些小夥子，我可以看出他們對入學的感覺是多麼異樣的。

他們一定是很興奮的。也許在新環境裏，最初感到有些恍然若失。但是他們很快就好了。再沒有一點羞怯的表現。當我從大會堂的講台上，問他們到學校裏來是幹啥的時候，一種充滿着自信的、響亮的聲音，像合唱一樣回答道：『學習！』當我告訴他們：我們對於優良的成績和模範的行爲獎給好的書籍，並且問他們誰願意就在當時登記爭取獎品的時候，他們一齊地舉起手來。

不錯，當我發出第二個問題——誰希望得『兩分』——的時候，他們也同樣迅速地舉起手來。但是，孩子們隨即抓住了我的意思，便愉快地笑了。我看出來他們完全懂得：『兩分』是個壞成績，『五分』才是最好的。正如M. I. 加里寧說的：『我們的學校不使兒童畏懼……』。一年級學生就很自豪地大步走進學校，如同走進自己家裏一樣。

我們第一次『組織』會散會後，家長們便把他們的孩子送進教室，給他們一些臨別囑言，便走開去了。只有教師們跟他們的新學生留下來。這時候是一個責任重大的時刻，是使你引起許多思緒的時刻。

我們的國家正在向共產主義邁進。今天開始上學的兒童就是明天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者和公民。政府已把準備他們去負起這個崇高責任底任務交給了我們教師。蘇維埃教師的首要任務，就是爲建設共產主義的工作而訓練我們的年青一代。但是

要建設，人們就必須具備知識。所以我們首先應該給學生打下一個一般知識底堅實基礎。

我強調『堅實』。去了解學生是否適當地吸收了和熟記了所授的教材，乃是蘇維埃教師的責任。離校的十年級學生應該全部掌握他在校所學的東西。他的升學證書應該是證明他已經有了獨立研究或工作的充分準備，已經有了進入實際生活的準備。學校的任務是給未來的公民們以教授和廣義的教育。照我們看來，這是一個唯一的不可缺少的過程。

自然，『教育』對於每一個人並非具有同樣的意義。一個美國作家告訴我們：洛杉磯的教育權威之一，安居·哥伯上校，有一次說過：『教育就是把許多青年人聚集一堂，教他們書中一課，聽他們背誦一遍，用數目字記下一個分數……。我們就是去幹這個，沒有別的。』

在我們看來，這只是一個野蠻人。關於野蠻人的『教育』的陳述。這種東西不是教育——它是兵營裏練操，它是一種麻醉後起一代的頭腦，阻止青年人自己去思想，使他們成為資本家底順服的奴隸的企圖。

對於我們，教育就是塑造人類，有系統地、很關心地影響他們的智力和品格。至於這個影響的基本方向，我們腦子裏是沒有問題的。我們的目的就是青年的共產主義教育。

在十年之內，我們教師幫助那些進入我們學校的孩子，去形成他們的個性。他們七歲時來到我們這兒；當離開我們時，他們都是青年男女了。我們的責任，就是在這段時期內給他們以正確的領導，使他們將來可以好好地立身處世。我們的責任，就是把社會主義社會所培養成的新型人類的最好品質灌輸給他們。

我們要學生們熱愛他們的偉大的祖國，曉得她光榮的過去，並清楚地看到她燦爛的將來。

我們一天天地培養他們具有成為共產主義者的品質：對人民和黨的忘我的忠誠、誠實、勇敢、堅毅，對工作的由衷的熱愛，在困難面前的堅忍不屈，以及隨時準備響應第一次號召，以無上的獻身精神去保衛自己的祖國。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我們學校裏的一位教師S·E·波格托娃，曾收到我們一個學生托利亞·米納也夫的父親的來信。對於我們，再沒有什麼比這信中的簡單而親切的詞句表示更高的讚揚了。這封信寫道：『請接受一個前方的紅軍戰士的謝意吧，因為他的兒子托利亞的信中流露着對祖國的熱愛。』

這就是我在歡迎七歲的孩子們第一天進學校時所發生的一些感想。

試向任何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問他覺得在文學中什麼人物可代表革命前俄羅斯的中等學校。他第一個選擇一定是別里可夫——柴霍甫的小說『戴圍巾的人』中的中學教員。這位別里可夫，老是耽心『有甚麼事情會發生』。祇有採用禁令，他才覺得放心。在任何一件准許了或認可了的事情中，他總是窺見『一種可疑的因素』。

在柴霍甫的作品中，還有另外一個人物，即以該人物命名的小說中的『文學教員』，這位教員慣常告訴他自己，說他並不是教育家，而祇是一個又魯鈍又沒有人格的官員；他從來沒有對教書感過興趣，不懂得也不理會教育學，沒有對付孩子們的技巧。『他教書的目的是什麼，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據他所知，他教書是沒有目的的。』

另外一個例子是蘇洛古伯的『小魔王』被列多洛夫——一個愛說謊言、放蕩不羈、色情狂、和身披教師外衣的十足無賴。還有柯洛連科的『現代人物誌』中的德文教員克朗茲：『看起來，好像這個人故意這樣搞：首先把他所教的學科弄得毫無意義，然後却叫學生們去精通它。』

我不是說革命前的中等學校裏完全沒有另一類型的教員。當然，在教育界中也有誠實的、有天良、有思想的人們，即努力給青年以真正的教育的人們。但是在俄羅斯文學中記載了別里可夫、被列多洛夫和克朗茲等人物，並不是無的放矢的。列寧在革命前所寫的一篇論教育的文章裏，曾提及過被列多洛夫，這是一件意味深長的事情。

因爲那時教育當局所鼓勵和提拔的，正是像別里可夫之流的冷酷官僚。造成當時中學校裏的氣氛，專門指揮別人的，也正是這一流人。無怪乎『戴圍巾的人』中有一個人物談到別里可夫時說：『我們教師們都怕他。甚至校長也怕他。祇要想想這個：我們教師都是聰明正直的人，以屠格涅夫和謝德林爲模範所教養成的人，可是這個老是穿着膠鞋和帶着雨傘的傢伙，竟把整個學校壓制了十五年！』

爲什麼情形會是這樣，這是極易解釋的。沙皇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目的，與教育的真正目的是遠如天壤之別的。政府極盡能事，要使學校與現實生活隔離起來。關於其週圍世界的極其需要的知識，政府不讓青年去接觸。他們都被塞進一種所謂『古典』教育：科學課程被減到最少限度，科學史被置之不理，中學生得不到一個認真的俄羅斯文學課程，而被迫熟記希臘原文和摘錄。這一切都是爲着要限制他們對於現實生活和世界歷史的真實發展的知識。

這種制度中的一切，都是枯燥、死氣沉沉和悶人的。教育部對進步的、革命民主的社會階層不斷地進行着不可調和的迫害。無怪乎列斯高夫特教授在給威爾斯基寫的『一個教師的手記』的序言中寫道：『我們根本沒有學校；我們所有的祇是懺悔所。』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結束了這個存在於國家的教育政策與進步的社會階層底期望之間的悲慘的矛盾。如今在我們國家裏，國家與人民對學校寄予同一期望，那就是

：學校給後起一代以廣泛的唯物主義教育和共產主義教育。

我們的政府、我們的人民和每一個蘇維埃家庭都懷着同一抱負：他們都要求學校在孩子們的頭腦中灌輸馬列主義科學的世界觀。我們都認識到：學校中的教育必須根據進步科學的最新成就來進行。自然科學的講授，應根據經過米邱林和李森科所進一步發展了的達爾文的理論。在歷史課程中，我們的孩子們必須知道，西方怎樣經常地受到了俄羅斯科學家和發明家的工作底重大影響。

在『共產主義教育』中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特殊的課程』。每一課程都必須教給學生一些新鮮事物，擴大他們的眼界，為他們建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打下另一塊基石，即令這塊基石是很微小的。

我們認為列寧的遺訓是金石銘言：把教育看作是與生命和政治不相干的東西，乃是一種虛妄的謊言。我們在一切工作中受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即蘇維埃制度不能以漠視蘇維埃政策的精神來教育青年。一個沒有思想原則和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教師，是我們所不能理解和容忍的事情。我們覺得黨中央關於思想問題的決議適用於我們蘇維埃教師，也正和適用於作家、劇作家、電影演出者和作曲家一樣。

波里士·馬爾庫斯來我們第一〇校時說過：『當戰爭爆發了，我們有些人成了軍官的時候，我們必須教育下級，教他們正確地辨別是非。當我在採取行動而猶豫不決的

時候，我便想着我自己的教師在同樣情況下將如何處理。」這也許祇是一簣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這是一件取自生活深處的小事。

斯大林同志說過：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想蘇維埃教師可以認為自己與作家們一樣，同是這個光榮領域裏的工作者。

三

英國工黨政府在上台時，曾經莊嚴地保證『人人教育機會均等』。『校長』雜誌也宣稱過：教育應『不分貧富，不分勞工或哲學家，也不分縫衣針製造者或法律製造者。』這些莊嚴的諾言和虔誠的意旨究竟有了什麼結果，這是人人皆曉，個個皆知的。在英國，『教育機會均等』仍然是不存在的。正和以前一樣，富翁的子弟是放在特殊的學校裏教，而農村中百分之八十五的兒童却仍然在所謂『寄宿』學校中唸書。在這些沒有特權的兒童中，十個裏面祇有個把上中學；至於上大學，那就絕大多數連做夢都別想。

要是我們相信那些專事吹牛的『美國之音』、美國雜誌和其他美國宣傳工具的話，那末，『教育機會均等』似乎早已在美國成為事實了。但是要相信這套東西的任何一點，都是十分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理由：第一、數百萬美國學齡兒童不能上學。我們可以相信，歸入這一類的並不是商人和粉麵廠主的兒子。我可以順便提及這點：在美國四十八州中有十七州的法律允許兒童不必上學，『因為他們太窮哪。』

其次，祇要看看美國的種族歧視，就把該國關於『教育機會均等』這句鬼話識破了。在十七個州和哥倫比亞區中，法律規定在教育中把黑人與白人分開。平均起來，用於一個黑人兒童的教育經費僅相當於一個白人兒童的教育經費的四分之一。當紐約一位中學教師叫她的學生寫一篇『怎樣改進白人與黑人間的關係』的文章時，沒有一個白人學生給這個問題提出了民主的解答。他們所有的作文中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貫穿着同一個『思想』，即整個教育制度給他們所形成的『思想』。有一個學生說那個學校裏的黑人是下等人，另一個說應該把他們再趕去當奴隸或者放逐到某一荒島上去，而且即使把他們全部消滅，他也不會介意的……。

在我們蘇維埃的教育辭典中，我們並沒有『教育機會均等』這個名詞。我們沒有它，是因為這個問題在蘇聯根本不存在，早在三十一年以前，即一九一七年十月，這個問題就已完全地、永久地獲得解決了。

我們的國民教育制度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產物。斯大林同志說：『至今曾佔過統治地位的一切階級——奴隸主、地主、資本家——同時又是富有的階級，他

們有教自己子弟以管理方面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的可能。工人階級與這些階級的區別就是在於：它是貧窮的階級，它從前沒有教自己子弟以管理方面的知識和技能的可能，而且它只在現在，在取得政權後，才獲得這種可能。」

僅僅說我們現在有一個法律使教育成爲普及和強迫還是不够全面的。在別的國家裏也有着類似的法律。可是在蘇聯，我們却具備了執行這個法律的一切必要條件，而且這個法律已是一字不差地施行了。第一一〇校的教師們，和國內所有其他學校裏的教師們一樣，每年得在其轄區內進行澈底的核査，務使所有七歲兒童的家長都把他們的孩子送進了學校。

在我們國內沒有一處地方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像美國廿二個州中的那種情形——這些州中的法律准許住得太遠的兒童不必上學。在蘇聯，每一個村莊或城鎮裏的每一條街道都是派給一定的學校，而這所學校（做家長的也是一樣）就向國家負責，在其轄區內遵守強迫教育的法令。比方說：假若在尼吉茨基林蔭大道或侯森街的第一一〇校的轄區內，發現有任何學齡兒童尚未進學校的話，我便認爲我個人應對此負責。

我們的學校沒有什麼特殊和不特殊的區分。這種區分在我們國家裏是不可想像的。在每一個蘇維埃學校裏都有來自各界的青年。就拿我所負責的這個學校爲例吧，將軍們和工人們的孩子，蘇維埃機關裏的普通職員和政府裏的官員們的孩子，都是並肩而坐，

而且在學習中互相競賽。

當然，蘇維埃人民並不以此爲奇。我們可以列舉千百萬個例子來說明我們真正的「國民」教育制度。即如列寧所了解的——人民的教育。我還想舉一個例子——這是我親自知道的一樁事：兩個姓庫普楚娃的母子很久以來便是我們學校裏的職員。母親依利莎維達·依萬洛芙娜是我們衣帽室的管理員。她的女兒艾卡德林娜·亞力山大洛芙娜曾在我們學校裏唸過書（男女合校時），她在師範學院畢業後，又回到我們學校裏來當地理教員。依利莎維達·依萬洛芙娜現在還是同以前一樣跟我們在一起，而她的女兒却正在完成她的研究課程。

我們的校舍就是過去弗列洛夫私立中學，係一九一〇年莫斯科的一羣闊市民集資興建的。隨着時代的演進，這所中學裏的風氣還算比較自由。可是，不管怎樣，這到底還是一所特權階級的學校，因爲別的且不說，單是學費就很高。一般說來，工農子弟在那時是很少進中學的。實際上，教育部也正式頒佈了一種限制「下層人」入學的法令。

沙皇政府的教育部長得利揚洛夫寫道：「倘若這個法令嚴格執行，那末馬夫、侍僕、厨子、洗衣婦、小店等諸如此類的人的孩子便無法闖進「中等學校」以及「中學先修班」來。或許，除開具有非凡的才能者，我們是不應該把這班人自其所處的環境中提拔出來的。」四十年前流傳一時的「厨子的孩子」一個詞兒，來由即此。

弗列洛夫中學實際上是一所特殊學校（或許名義上不是）。學生的家長們從來也不會想到校內將會出現一羣「孤兒」或「身世不明」的兒童，然而，在一九二五年一個晴朗的秋天，正是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在那時以前，這所舊中學已是統一學制（按指十年制——譯者）中的一部份，現在它就被併入七年制的「光明之路」孤兒教養院了。這個「孤兒教養院」的院長（本書作者）被委為這個聯合中學的校長。我的二百五十名學生馬上就贏得了其他孩子們的尊敬，並且成為了領袖。想起這件事，我覺得很得意。

到現在已經二十三年了。我們的學校已變得那麼壯大！蘇維埃國家為它盡了多少的力！校舍已經全部重建，並且加蓋了一層新樓，裏面有寬敞的、空氣流通的教室。原來存書不多的學校圖書館現已擴充到一萬九千冊了。新的物理、生物、地理、化學和文學研究室設備得很完善，在一九二五年改組時所開列的校產清單中，全校財產約值一萬四千五百盧布。而現在呢？單祇圖書館就值六萬盧布，而物理實驗室值十萬盧布以上。

我們學校的成長反映着全蘇聯興建學校的巨大規模。就是今年，就有一千所以上的新校舍落成了。去年秋季，莫斯科的學童十個中就有七個到新校舍裏去上學。為了他們的年青一代，蘇維埃人民是絲毫不吝惜什麼的。

在蘇維埃國家裏，最好的東西都用在兒童身上，一切學校的經費都是由國家支出。

一九四八年的教育經費（註）超過五百九十億盧布。（我想特地提出：其中五十多萬盧布是用在我們第一一〇校的。）

五百九十多億盧布用作教育經費！幾乎佔全國總預算百分之十六！要明瞭這個數目的全部意義，我們祇要想一想美國的數目字就夠了。美國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而自戰後以來，她的國民教育經費却僅及國家總預算的百分之一而已。

（註）一九四九年的教育經費是六百零八億盧布。

四

這個新學年開學的籌備工作，湊巧跟我手下一件別的緊要事務碰在一起了。這是一個令人愉快（雖然有些辛苦）的任務，這個任務就是替我們十七位教師寫介紹書。依照法律規定，他們因服務年久而獲得受勳的資格。這十七位教師都受了勳，其中有六位榮膺列寧勳章。在這次以前，我們教員中就有好幾位得過政府的褒獎；三位獲得勳章，還有三位獲得『共和國功勳教師』的稱號。

『功勳教師』！這個最高榮譽的號是授給教師們，以獎勵他們的教育天才和對教育事業的熱心的。對於這件事，我們絲毫看不出有什麼稀奇，正如對於蘇維埃時代裏許多多已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份的其他事物，我們也看不出有什麼稀奇一樣。然而，要